

遼寧黨史資料

第 三 輯

中共辽宁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

辽宁党史资料

第 三 辑

1989年·沈阳

本辑主审：李清霖

责任编辑：高 炬

本辑校对：刘颖平

辽宁党史资料

第三辑

中共辽宁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

(沈阳市皇姑区北陵大街四段一号)

850×1168毫米 大32开本 字数：20

1988年11月沈阳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

辽出临图字(88)第251号 印数50

辽宁省供销社印刷厂印刷

工本费 3.00元

目 录

回 忆 录

不愿做奴隶的人们

——记东北大学的抗日斗争 张金辉 (1)

我所知道的党在东北救国会中的工作 郑洪轩 (14)

党派我参加东北义勇军的前前后后 侯 箭 (20)

开展敌后抗战工作的回忆 周治国 (31)

在西安东北军的日子 金铁群 (37)

联络东北军共同抗日 刘培植 (45)

东北军学兵队的抗日活动 张树权 (53)

战斗在白山黑水间

——忆抗联斗争生活 王一知 (61)

深入日伪腹地，配合抗战反攻 王 楨 (70)

由潜伏到跃起 赵文隆 (75)

对侵华日军的最后一战 李运昌 (89)

历史的审判

——忆在沈阳审判日本战争罪犯 袁 光 (95)

日本战犯的新生

——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回忆 汪金祥 (102)

人 物 述 林

列宁勋章的荣获者

——唐铎生平事略……………徐建源(117)

功勋卓著的“搭桥人”

——高福源生平事略……………吕正操(136)

赵尚志传略……………秦奎一(143)

李东光传略……………刘贵田(158)

李靖宇传略……………辽阳市民政局(174)

专 题 史 料

大连地下党的光辉战斗里程(1926—1945)

……………大连市委党史工委(185)

锦州地区义勇军的抗日斗争……………锦州市委党史办(201)

中共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(晋察冀时期)始末

……………高峰高阳(229)

塞北星火

——记辽宁建平县早期革命青年群体……………胡广志(246)

不愿做奴隶的人们

——记东北大学的抗日斗争

● 张金辉

事变离乡

“九·一八”之夜，我们东北大学的学生，刚从教室自习回到宿舍，突然传来激烈的炮声。同学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炮声所震惊，蜂拥到窗前向外张望。只见窗外一道道炮弹的闪光划破夜空，从西南的日本车站飞向沈阳东北的北大营。虽然我们不知道其中详情，但可以肯定是日本军队正在进攻北大营的中国军队。顿时，全校大哗。我同宋黎等几个要好的同学，一口气跑到刘馥教授家中，只见这位老教授正在门外仰天长叹。刘教授为我们分析形势，说无疑是日本帝国主义公然的侵略行动，战事一起，我们再不能安心教学了。他还对我们说，国难当头，有志的青年，应当奋起抵抗，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。当时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激愤地流下眼泪。

枪炮之声，彻夜未息。我们回到校内，聚在一起等着最后消息，学校当局对此似乎同我们一样茫然，也无人出来说明情况，安定人心。

一夜，就在这样焦急无奈中度过。次日清晨，消息陆续传来，说日军已攻占北大营，城内也全是日本兵。有的同学从城里

出来，见沿途死尸横陈，日军还在到处行凶。又有人说，东北军在日军攻击时不战而溃，军政要人纷纷弃职而逃，沈阳已在日本军队的控制之下。这时，悲愤交集的师生们群龙无首，学校已完全陷于混乱状态。学生们义愤填膺，自动集合在理工大楼开会，许多人痛哭流涕地登台演讲。有的主张学生们组织起来，参加军队进行抵抗；有的要求向张学良请愿，要张学良出面抵抗；也有的说，几十万大军都不抵抗，几个赤手空拳的学生又能有什么用！总之，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在联欢会上，张希尧上台发表演说，主张青年学生在此困难当头之秋，不应动摇徬徨，而应以“投笔从戎”的毅然态度，参加抗日救国活动。他的意见，得到不少进步同学的拥护。但许多学生仍认为抗日是政府的事，学生就是读书。这时，听说日军快来武装接收学校，谁也不愿留在校内束手待擒。同学们有的不告而别，有的在等待校方通知，最后是四处流散了。希尧和我、宋黎等进步同学集结起来，离校向北行走。大家虽惶惶然不知如何行动，但都不甘心做亡国奴，要以铁血去保卫国家民族。

我们这群毫无组织的学生，携带着简单的行装，好象失巢之鸟，徬徨于沈阳北郊。所到之处都看到一些同样在徬徨的散兵，他们也找不到部队，有的已把枪支抛掉，自谋生路了。从这些散兵口中，我们进一步得知，在日寇进攻沈阳时，东北军竟奉命不加抵抗，使日寇在数小时内，就占据全城。这个消息，使我们又惊又气，可沈阳城外群众还蒙在鼓里。许多忧心忡忡的老百姓，都聚在村头路旁，引颈翘望，遇到从沈阳逃出的人就围上去探问消息。

当天晚上，我们行至沈阳北郊三台子一个小学校里。我记得，那时已近中秋节，明月虽然高悬，但显得分外暗淡无光。我们向小学校教师宣传抗日救国，向老乡们控诉日本帝国主义悍然侵占沈阳、屠杀中国军民的罪行。夜里，我们就住在小学校的教

室里。我和其他同学一样，躺在一条又窄又短的凳子上，昏昏沉沉地过了一夜。

天明之后，传言更多，人们也更加慌乱，听说日本兵已开到沈阳四郊，到处捕捉抗日分子。我们滞留在这里，随时可能发生危险。为了缩小目标，我们这伙学生也各自分散。剩下希尧、宋黎、我和其他几个人。回家是没有出路的，我们遂决定潜回沈阳，相约回到校内，再做长远打算。

趁着黄昏，我们偷偷回到学校，日本人还没有来到学校，校内教职员大都逃散，留下的只是少数无路可逃之人。还有几个警察，不知是谁请来维持秩序的。为防备日本浪人闯入学校捣乱，我们将校内学生组织起来，成立了“学生护校团”手持棍棒守卫学校。第二天，宋黎化妆工人模样到城里去探听情况，回来后说，国货商店被日军捣毁，青年会也被占领，街上浪人横行，无辜平民有的竟被日寇残杀。还传闻日军要来武装接管学校，形势很紧张。希尧同我们几人商议，认为在校内坚持已无意义。决定先离校进关，再相机而动。于是，又派人前往“京沈车站”探问情况。探问的人带回消息说，站内还有开往北平的火车，希尧同我、苗可秀、宋黎等人连夜收拾行装，为了不使贵重物品落入日寇之手，希尧将学校作化学实验的白金锅带走，（到北京后交给东北大学秘书长王卓然）。我们离校时，校内已满园死寂，空无一人。

“京沈铁路”，是英国人经营的，暂时还未被日军控制。我们赶到车站，站内已是人山人海，只有几个英国人在维持秩序。每有一列车开到，逃难的人便争抢上车，真是一片混乱不堪的凄惨情景。天明之后，日本飞机在天空盘旋，轰鸣之声不绝于耳，更增加了站内恐慌混乱的气氛。在站上维持秩序的英国人，都手持一面英国国旗。直到上午，我们几人才挤上一节敞蓬车厢。车里挤得人喘不过气来，外边的人还拚命往车上挤，挤上来的人也

都压在车内人们身上，压得孩子哭，大人叫。已上车的人，只好联合起来不让别人再往车里爬上来，有的又被推下去。有的人在车下哭喊，说好话哀求。更惨的是一家人挤上几个，还剩几个却无论如何也挤不上来，只好相约在某地相聚。无辜的男女老少那凄惨的哭叫声，真让人肝肠俱裂。这种逃命的惨景，是我终生难忘的。直到火车已徐徐开动，有人还不顾死活地往车上爬。目睹这些情形，我不禁悲愤交集。为什么我们要被外寇逼迫逃离自己的家乡？为什么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却要靠英国人的保护？为什么几十万大军一枪不放地丢弃了这大好河山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些问题谁能解答？我含着热泪望着离去的故乡，心中却有着一个坚定的信念：总有一天，我会回来的！

火车虽然开出了沈阳，车上人们紧张的心情却并未因此稍减。每到一站，车站上都挤满了恐慌的人群，围上来问长问短。火车到达锦州，听说张作相（当时任吉林省省长）在那里，张希尧等便下车去询问情况。东北军的第三旅正驻在锦州站，旅长张庭枢，就是张作相的儿子。我们在车站上向第三旅的士兵宣传抗日，要求他们开回东北去掉转枪口打日寇。士兵表示愿意抗日，但要听长官的。而他们的旅长，那时正在娶第三房姨太太！一边是国破家亡，一边却是洞房花烛，此情此景，怎能不令人气愤！希尧回来后告诉我们，张作相也没有什么主张。我们又登上火车继续南下。夜晚明月当空，火车风驰电掣，我们躺在车上仰望明月，相对无言，大有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之感。火车一站站南行，离故乡越来越远，从此，我们开始了流亡生活。

流 亡 北 平

北平，这座古老的城市，她是明清帝王之都，又是北洋军阀霸地。鸦片战争以来，她屡遭帝国主义的蹂躏，也是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英雄之城，“义和团”称雄于此，“五四”运动发源

于此。我们这些流亡之人，踏入这座古都，追怀往事，真是触景生情，感慨万端。满腹国恨家仇，象烈火一样时刻在灼烧着我们的心肺。可这里的人们，仍旧过着太平的日子，达官贵人，依然是灯红酒绿，纸醉金迷，一副“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”的景象，怎能不使人痛心疾首。

来到北平，我们这一行人先投奔“奉天会馆”落脚。这个会馆，座落在西单旧刑部街，紧靠着有名的“哈尔飞戏院”（今西单剧场），原是奉天人在北京的同乡会会址，也是一些奉天出身的官僚政客聚会的场所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一些流亡到北平的东北上层人物均来到这里，如阎宝航（原沈阳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）、车向忱（国民常识促进会负责人）、高崇民（原辽宁农会会长）、王化一（原沈阳教育会长）、卢广绩（原沈阳工商会副会长）、王卓然等，全在这里聚会。开始，这个会馆被用来收容东北的流亡青年，不久，在张学良支持下，上述东北名流在奉天会馆组织了“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”。这个东北各界人士组成的抗日群众团体，得到东北流亡和北平各界的支持，大力开展了抗日救国、收复失地的宣传活动。“东教会”的领导人，均为张学良在东北的幕僚和东北知名的爱国人士，其成员则较为复杂，除彭振国（曾在东北军任过军长）、熊飞（曾任沈阳公安局督察长）和李梦兴、潘赓祺、徐靖远、黄宇宙等张学良系统东北中上层人士外，也有东北籍的国民党人如黄剑秋、钱公来和青年党人霍维舟等。东北青年学生中，则有张希尧、苗可秀、宋黎、赵桐、高鹏、纪庭榭和我参加，都是救国会的下层活动分子。

救国会成立后，许多东北青年学生纷纷找到救国会，要求参加抗日活动。11月，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宣武门外的江西会馆组织东北学生军，对青年学生进行训练，准备将他们派回东北，进行抗日活动。这支东北学生军由张希尧等负责。这时，东北大学、冯庸大学等先后在北平设校复学。东北流亡学生思想混乱，

各有各的打算，有的仍然要走读书救国的道路，在北平继续复学，有的就投笔从戎，走上直接抗日救亡的道路。我和宋黎、苗可秀等人认为，国破家亡，山河不保，哪里还有我们读书的安定环境。而且，日寇侵略气焰日张，北平、华北以至全中国都朝不保夕，只有全国人民奋起抵抗，才能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，所以，我们这批学生都参加了学生军。

学生军共有二三百个东北青年学生，集中进行军事训练。生活条件相当艰苦，大家吃的是粗粮，睡的是地板。每天清早，就起床跑步，白天出军事操，上国术课，学习射击、投弹、肉搏技术，还学习制作炸弹的方法和爆破技术。教员都是平薪聘请的，有的更是不要分文，白尽义务。学生军还请来一些救国会负责人和社会名流作政治报告，宣传抗日爱国思想。在这期间，我们也经常组织小型宣传队走上街头、学校，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。学生军的宣传员向群众讲述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，控诉日寇在东北烧杀抢掠的罪行，宣传东北人民抗日救亡活动的英雄事迹；讲到激动之处，往往声泪俱下，听众也为之动容。尽管形势还在恶化，生活也十分紧张，可是，我们却毫无怨言地忍受着艰苦的生活和严格的训练，一心要锻炼自己，早日在战场上同敌寇决一死战。在我们心中，燃烧着抗日的火种，充满必胜的信心。大家经常唱的是“满江红”等歌曲，藉以抒发为国雪耻、为民复仇的壮志雄心。

我在学生军中任交涉科长，负责学生军的对外联络。这项工作，主要是争取各方面对学生军的支持。为了解决学生军经费和物资上的困难，我经常为募捐而奔走各地，曾到唐山找过公安局长宁武和他太太（都是东北人），为学生募捐了一批棉衣；还曾跑到察哈尔，找到当时任省主席的东北人刘一飞，为学生军募了一笔伙食费。这些人，出于爱国心，又是东北同乡的关系，对学生军都很热心。北平各界和不少东北爱国人士，都给学生军以援

助。

在流亡北平的日子里，形势越来越恶化。日本帝国主义几乎完全占领了东北全境，国民党却坚决主张对日不抵抗。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从北平专程到宁、沪请愿，要求蒋介石抗日，收复失地，无结果而归。张学良受制于蒋介石，亦无能为力。相反，日本帝国主义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面前得寸进尺，不仅在东北各地肆意残杀抗日人民；更将铁蹄伸向关内，妄图进而侵占热河，进逼平津。在天津、上海就曾一再发生日本浪人挑衅事件，不久，上海又发生“一·二八”战事，日寇侵华野心暴露无遗。

残酷无情的现实，使我们这些热血青年悲愤交加。日本帝国主义固然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死敌；苟且偷生、开门揖盗的国民党政府，也彻底地失去了我们的信任。我们当时的思想是：救亡抗日、收复家乡，只有靠我们青年一代。腐败堕落的国民党不能抗日，钻营投机、一心发国难财的官僚政客也不能抗日。基于这种思想，我们当时对党派问题也很厌烦，对共产党尚无深刻的认识，反而听到一些诬蔑宣传。因而，我们这些年轻人主张：只要能抗日救国，不必去参加什么党派。从这里，也可以看出我们那时在政治上是何等幼稚！

在流亡中，希尧原有的肺病又发作了，经友人帮助，到香山慈幼院内一个安静的地方疗养，短时期不能外出，学生军的工作由苗可秀负责。希尧的病，既有艰苦环境的影响，更在于他对国家民族的忧虑。当时，由于交通不便，我和他很少会见。我只是抽空去过几次，这次见面，他同我谈的都是救亡大事，一谈就很激动。有一次，我夜宿于他处，彻夜谈心，激动得相对而泣。所想者仍是国破家亡，救国无路。多少青年人一腔热血，请缨报国，达官贵人却醉生梦死，丧权辱国。“一·二八”战事之初，全国沸腾，激言抗日；时过不久，销声匿迹，眼看日寇鲸吞蚕食，步步深入，中华民族的灾难，日益深重，如此下去，国家与民族命

运，真是不堪设想！怎能不让人忧愤！希尧与我谈及这些，也每每相互鼓励，救亡图强，不惜以身殉救亡之事业。

潜 回 东 北

流亡北平的生活，使人尝够了有家难归、有国难投的滋味。我和一些同志都感到，要抗日就要回东北去进行实际的斗争，只在关内徒喊和平口号是没有用处的。我又听说日寇铁蹄虽已踏遍东北三省，但是，东北人民不甘于亡国奴的命运，抗日斗争已经风起云涌，抗日义勇军遍布于白山黑水、松辽平原。“九·一八”之后，东北流亡人士莫不渴望打回老家去。“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”成立后，亦多次派遣人员，回到东北开展抗日活动。1931年底，宋黎随车向忱先生出关去进行东北救亡活动。我和其他爱国青年，更急于重返东北，参加抗日斗争。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希尧，他极为赞同。于是，我正式向“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”提出，回东北进行抗日工作。

1932年2月底，救国会负责人王卓然、王化一和我谈了话，告诉我“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”决定派我回东北活动。任务是组织抗日义勇军，争取、策反伪军，搜集日寇在东北的侵略罪行等。并拨给我一些活动经费，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。

正当生活在北平的人们欢渡“元宵节”的时候，我已作好潜回东北的准备。希尧知我要走，特地抱病从香山赶到城里送行。我们告别于一家饭馆里，希尧为我买了两盘饺子，但谁也吃不去。兄弟二人，再三相属珍重。他病情依然严重，我回东北，也冒有生命危险，此次分手，颇有生离死别之感。但是，我们互相鼓励，一定要胜利重聚！

元宵之夜，万家灯火辉煌之时，我装扮成一个商人，带着一个包袱，登上“北宁路”火车，悄然离开了北平。同行的还有三个东北军人，他们是救国会派回东北伪军中进行工作的。为了避

人眼目，我们四人已约好，彼此装作路人，互不相识，各自行动。

火车到达塘沽，我们即下车改乘开往大连的日本商船。我坐普通船舱，里面十分拥挤，我们混在人群中，以便于隐蔽。次日傍晚，轮船启航了。这是我第一次乘坐海船。看看轮船慢慢地离开祖国大地，驶向深海，遥望东方，水天相连，船下近海岸的黄色海水和远海的深兰色海水，象被一条无形的线划开，界限分明。陆地渐渐从视野消失了，太阳也沉入了西方的海面，一轮明月，悬挂在海天之上。我站在甲板上，四周夜色微茫，海浪拍打船弦，发出阵阵哗哗声响。遥望东北，我心中极不平静，仿佛看见听见了故乡在日寇铁蹄下挣扎的呻吟声和惨不忍睹的景象，我觉得轮船行驶得太慢了，真恨不得一步踏上故乡的土地。

深夜，船入远海，开始猛烈颠簸。我躺在统舱铺位上，辗转难眠，四顾同船旅客，都是各怀心事。我们四人，彼此心照不宣。轮船颠簸越来越烈，我只觉头昏眼花，腹内也随着鼓动翻滚起来，一阵恶心，我知道这是晕船的症候，连忙爬起来到甲板上，向海里呕吐。开始吐了些食物，后来吐出去的尽是苦水，最后什么也吐不出来，仍然拼命呕吐，仿佛五脏六腑都能吐出才好。我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了，身子俯在栏杆上任其呕吐，真说不出的痛苦。好久，我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回到统舱。同船旅客中有人说，船过老铁山头时，海浪特别大，船也就摇曳的特别厉害，驶过老铁山头就会好了。我合衣在铺位上倒下，果然，不久船似乎真不那么颠簸了，我也昏昏入睡。

震耳的锣声和嘈杂的人声，把我从昏睡中惊醒。船已靠近大连港了。所有旅客都被唤到甲板上集合，听候日军的检查。那时，日寇在山海关、大连两个海陆关口的检查十分严格，人们都将这两个关口称为“鬼门关”。我随着人群登上甲板等候检查，心中在想，不知能不能顺利通过这道“鬼门关”。但见从岸边驶来几只小艇，每只艇上都挂着刺眼的太阳旗。小艇靠上轮船，许

多日本宪兵、侦探和身穿白衣的“医生”相继登上甲板，对每个旅客进行仔细检查。这群凶恶的敌人，用豺狼般的眼光审视着每个旅客，一个人一个人地过“关”。面对这些敌人，既不能紧张害怕，又不能旁若无人，如何坦然对待，这也是一种斗争艺术。稍有异样，就会被残暴的敌人抓出带走，从此也就再无下落。在这条船上，被日寇抓走了有十几个人。检查过后，轮船靠岸，旅客依然排列成行走出码头。这里又有日寇军警检查行囊，逐件摸索询问。好在我带的东西很简单，未引起敌人注意，总算平安地通过了这道“鬼门关”。

走出码头警戒区，立刻有客棧接待人员上来争抢着延揽住店，我不加选择地随着接待人员住到一家客棧，心神才算安定下来。在客棧略事休息后，我就到街上转转。沿街行走，发觉这个重要的港口在敌人多年的统治下，已完全日本化了。所有街道、房屋都是日本式的，街道名称和商店招牌、广告，也都使用日文，飞扬跋扈的日本人满街横行，那神态分明自视为这块土地的主人！我不由地想到：将来不是我们收复这个地方，就是整个中国都变成这种样子，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！

当天下午，我又坐上“南满路”火车，北上沈阳。火车在大雪冰封的原野上飞奔，故乡的景色，多么美丽动人。望着窗外白茫茫的山川大地，我不禁热泪盈眶。想到久别的家乡，故土的亲人，正在日寇铁蹄下痛苦呻吟，一种强烈的战斗热情使我振奋起来，开始考虑：到沈阳后，怎样开展抗日斗争。

第二天上午，火车已抵达沈阳。走出车站，我立刻发现这座分别数月的城市，眼下已面目全非。触目惊心的太阳旗，到处可见；耀武扬威的日本宪兵，沿街巡查行人，烟馆林立，日本浪人横行；还有一些“新民会”、“大同学院”等汉奸组织的招牌，也恬不知耻地挂了出来；日文广告、日语速成班的广告充斥街头巷尾。看到这些情景，令人欲哭无泪。强烈的民族仇恨，在我心头

燃烧着，要战斗、战斗，用铁和血来战斗！我深深感到，救民族的危亡，挽狂澜之欲倒，这是我们一代青年责无旁贷的使命！

组 织 抗 日

在沈阳，我首先找到大学同学郭明德。这时他仍住在城北虎石台站鸭子厂的家中。我同郭明德开门见山说明了来意，他又惊又喜，让我在他家住下来。随后我们长谈几次，我向他介绍了关内的形势和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活动，也提到我回东北的任务。这位当初同我们一道参加过抗日宣传的同学，立即表示决心和我们共同奋斗。他向我介绍了留在东北的一些同学在“九·一八”浩劫后的悲惨情况和要求抗日的迫切心情。我看郭明德态度很坚决（他妻子苏志德是个贤惠的妇女，在城中又有亲戚），我便同他商议，由他出面通过关系谋得护身职业，尽快在沈阳城里组织家庭，作为我们活动的据点，以便长期斗争；我则到各地进行联络。

同郭明德分手后，我先到铁岭找到原东北大学同学江涛（原名江凤翥），又到开原找到希尧高中时的同学肖明先（当时他在开原中学教书），然后回到西丰，对家中亲人谎称我现在沈阳做事，父老都很相信；同时又联络了一些同学，如王栖忱（我的姐夫）张坦之（原名张维藩西丰中学教员）、李士廉、刘蓬、徐锐等人。这些青年，身受亡国之苦，对抗日救国都很积极，稍一鼓动，便决心参加抗日斗争。我还同当时任西丰县教育局长的高文翰进行了联系，他虽然在伪县署任职，但有抗日思想，对抗日活动很同情。我向他介绍了“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”的情况，也讲了我回来是进行抗日活动的。他表示支持我们，并同意我用教育局课员的身份活动。我遂用这个名义印了名片，作为掩护。我离开西丰后，又绕道至西安海龙、清原等地，分别找到原东北大学同学张永庆等，他们也都坚决表示和我们一同干。一路奔波，

虽然迭遇风险，但是找到这样多的抗日同志，使我很受鼓舞。

3月底、4月初回到沈阳，在郭明德处意外地见到宋黎，他在哈尔滨同车向忱先生分手后，回南满找我接头。不久，郭明德已通过关系在伪“满洲日报”找到了记者的职业，并同爱人在沈阳市内找了房屋。我即冒充其弟，住在他家中；在沈阳，又联络到戴昊等同志。随后江涛也来到沈阳，经郭明德介绍，在伪“大同日报”找到编辑职业，又为我们建立了一个联络地点。经过这一番努力，我潜回东北的第一步工作已经顺利完成，在沈阳取得了立足之地。

5、6月间，我在沈阳听说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派车向忱先生来到东北，前往北满和马占山取得联络。我便赶到哈尔滨准备和车向忱联系，研究如何开展工作。在哈尔滨，我同当时在法院工作的姓关的法官接上头，在大同疗养院等了十几天，未能见到车先生，因沈阳工作还待我安排，又匆匆返回沈阳。

6、7月间，我联络的一些同志陆续来到沈阳。我们研究，为了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抗日活动，应当成立一个组织。于是，我和宋黎、郭明德、江涛、戴昊、李士廉等同志便商议决定成立“东北青年抗日铁血团”，其宗旨是组织东北青年，用铁和血同日本帝国主义斗争，收复东北失地。

“东北青年抗日铁血团”成立时，我们七人在沈阳大南边门外南塔下，共饮了苦酒，宣誓要抛头颅，洒热血，为祖国牺牲一切。当时，大家公推我充任这个青年抗日团体的主席，宋黎为军事部长，江涛为政治部长，戴昊为宣传部长，郭明德为经济部长。同时还决定团体的主要任务为：组织和发动抗日义勇军，打入并争取瓦解伪军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，对日寇进行破坏暗杀活动；发动东北青年参加抗日活动等。

成立这个组织后，我们的同志越来越多，达到七八十人，都是具有抗日思想的青年学生。但是，从成立组织的过程和活动内